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7.01.002

# 试论邓拓办报的“书卷气”

许莹,周贯华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 作为一名具有“书生气”的知识分子,邓拓对中国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兼收并蓄,造就了他独特的“书卷气”办报风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传统文化的艺术、深厚的学识使他在报刊活动中既坚持求真、求实的独立思考精神,又追求报刊的可读性与群众性,而坚持党性则使其“书卷气”独具一格。

[关键词] 邓拓;“书卷气”;党性

[中图分类号] G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7)01-0008-04

## Analysis of Deng Tuo's Bookish Newspaper Thought

XU Ying; ZHOU Guanhu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combin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Marxism –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Deng Tuo, as a bookish intellectual, created a unique newspaper style. The theory of the Marxism –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the artist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found knowledge not only made him have a matter – of – fact attitude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in his press activities, but made him pursue readable and mass journals. However, Deng Tuo's bookish newspaper thought always stick to the Party spirit, which makes his style unique.

**Key words:** Deng Tuo; bookish; Party spirit

1956年《文汇报》复刊之时,邓拓曾对徐铸成说,《文汇报》复刊后要充满“书卷气”,是“读书人看的报纸”。邓拓此言中的“书卷气”不仅止于对知识分子色彩浓厚的《文汇报》而言,事实上,邓拓个人的办报活动就具有明显的“书卷气”。这种“书卷气”来自多年积累所形成的文化境界,又体现为一种办报风格,是邓拓报刊活动中特殊的一面。

邓拓的“书卷气”有别于普通所指的“书生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报人,邓拓有着“书生办报”的典型特征,有学者将其“书生办报”的内涵归结为:济世精神、求真精神、独立意识和理想情怀,<sup>[1]</sup>而在“书生”之外,邓拓又是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革命者,若从知识文化背景来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邓拓知

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共同造就了邓拓的精神视野,造就了他独有的文化境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使邓拓有“追寻历史正义”<sup>[2]</sup>的崇高精神追求,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指出了现实的道路,使邓拓投身于革命,从一名“书生”转变成为一名革命志士。在报刊活动中,马列、毛泽东思想使他重视报刊理论宣传,充分发挥党报的指导与组织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又使他重视报刊的济世作用,对于两者的兼顾,使其在坚持求真、求实的基础上,走党报的群众路线道路,使报纸既是“读书人看的报纸”,更是“群众看的报纸”。坚持党性基础上的理论性兼具可读性、艺术性兼具知识性、求真求实与群众性构成了邓拓报刊活动的“书卷气”。

收稿日期: 2017-01-06

作者简介: 许莹(1975-),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史论;周贯华(1991-),女,山东菏泽人,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

## 一 理论性兼具可读性

邓拓办报的“书卷气”首先表现在始终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邓拓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初来源是20世纪20年代的那场“科玄之战”,陈独秀等人的唯物史观深刻地影响了青少年时期的邓拓,使其对改造社会的认识体现为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经过革命活动的淬炼和大学时期的研究思考后,以“左翼”身份投入到新闻工作中。1930年代,在加入“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后,结合革命形势和党的革命任务,邓拓开始撰写理论文章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宣传,1933年的《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表现出了高度的辩证主义唯物思想,而1937年的《中国拓荒史》更令其被认为是“能写大块理论文章的人”。总体上看,邓拓的办报活动分可划为三个时期:1937年至1948年主编《晋察冀日报》时期,1949年至1958年主持《人民日报》时期,1958年至1966年主编《前线》时期。<sup>[3]</sup>与多数知识分子报人不同,邓拓的报刊活动是围绕着党报所进行的,理论宣传既是党报的任务,又是党报理论形成的依据,对理论宣传的重视在各个办报时期都有突出的体现。

1938年,邓拓带领晋察冀日报社以“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42年,他撰写的《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描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sup>[4]</sup>1944年,邓拓又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任报社理论组(部)的工作。1950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一场“谁领导了五四运动”的大讨论,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谁领导了“五四”运动?》,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对“五四运动”下了一个定义:“三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sup>[5]311</sup>

在利用报刊进行理论宣传时,邓拓使用的并不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而是把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和方式,比如,在对毛泽东《论持久战》进行宣传时,《晋察冀日报》副刊就刊登文章《中国能马上打败鬼子吗》《为什么说是熬年月的战法》《蛇吞象》等,理论性宣传并不是简单地刊印经典著作和党的决议,而是在结合实际情况和典型材料的基础上,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出发,用简单的话语进行深刻地剖析后,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把指导性与可读性紧密的结合起来。

加强新闻报刊的理论性是“新闻工作是最经常

的、最有力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党领导的新闻报刊是我们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武器”。<sup>[5]401</sup>邓拓认为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应该力求通晓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方法,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充分分析事物的矛盾,这样才能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完成新闻工作任务。正如《晋察冀日报》的改刊题词中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统一边区人民的思想一致和巩固团结共同抗日的武器,也是边区人民重视的言论代表和行动指南,它将成为边区文化战线上铁的正规军”<sup>[6]</sup>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宣传,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和抗战路线方针的认识,也坚定了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促进了解放区的发展团结。无产阶级报刊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武器,思想理论战线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战线,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宣传给予了人民群众精神上的鼓舞,并指引现实的道路。

## 二 艺术性兼具知识性

自维新运动开启国人办报热潮,“开民智”即成为报刊被寄寓的重要功能,传播知识是一方面,通俗化是另一方面。从初期西学的传播与报章文体的创建,到其后思想启蒙与白话文运动的推行,都是这两方面的表现。作为知识分子报人,邓拓在办报活动也践行着这一传统,以通俗的艺术性与知识性服务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传播。

他认为报纸的理论性与艺术性并不冲突,以报刊为载体进行文艺创作可以提高报刊的艺术性,也使报刊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1944年,他撰写了《聂荣臻将军在晋察冀》一文,其中用清丽的文字和豪壮的激情报道了聂荣臻在革命战争中的成长历程,描写了晋察冀的英雄事迹,歌颂了抗日战争的正义事业,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他曾邀请丁玲主编《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并且,随着大量知识分子来到边区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小说、漫画、诗歌、木刻、杂文等越来越多的文艺形式出现在《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形成了文艺创作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相结合,通俗内容蕴含高雅情趣和艺术追求的特色,成为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文艺副刊中有关革命前线的报道摧毁了日寇的欺骗宣传、毒化教育,有关农业生产的诗歌指导了人民群众日常劳作,有关现代科学文明的介绍打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为贯彻执行“双百方针”,邓拓主持了《人民日报》改版并支持《文汇报》复刊。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内容充实语言活泼,复刊后的《文汇报》成为知识分子争鸣的阵地,在1956年下半年宽

松的文化氛围中,这两个报刊成为艺术繁荣的文化阵地。离开《人民日报》后,邓拓进行了大量的文学、诗歌、书法作品创作,保持对艺术的追求,《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中的作品都表现出他较高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能力。在《燕山夜话》中,邓拓谈政策时事,谈思想哲学,也谈科学艺术和工作学习等等,其中既有中国古典经、史、子、集的内容,也对西方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有所涉猎,通过引人入胜的典故或事例,把人民群众的视野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升到了思想、文化的高度,“其中大量的‘无典不說話,非古不著文’,历史典籍的出现大大增加了文章的书卷气和文化内涵”。<sup>[7]</sup>

邓拓曾对《桂林日报》的同志说,“人民群众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包括生活志趣、身体健康、文化爱好等等,不单单是政治生活问题……报纸也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同时又是传播文化、新知识、新技术、新科学的工具。”<sup>[5]425</sup>“多登载神话、民间故事和美丽的传说,一定能够吸引广大读者……报纸可以办得很生动。”<sup>[5]426</sup>“真正好的通讯也就是好的文艺”。<sup>[5]289</sup>他主张编辑、记者要成为“杂家”,用专门的学问和广博的知识去从事新闻工作,报纸才能成为读者“科学知识的朋友”“文艺欣赏的朋友”,使读者在各方面都有精神的鼓舞。

### 三 求真、求实与群众性

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思想路线,更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迂”“直”的精神相契合。邓拓在加强报刊理论性和艺术性的同时,一直坚持求真、求实的原则从事报刊活动,始终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现实情况出发,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把新闻活动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实际生活中,切实保持新闻报刊的生命力所在。

他曾经说:“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报纸一定要做‘热心人’,要关心群众,做群众的朋友。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不论是思想的、工作的、生活的或者是学习的,报纸都要敢于触及,给予回答。这样,报纸的读者会时时刻刻感到你是在关心他,报纸才能办得得人心,才一能成为读者的知心朋友。”<sup>[8]</sup>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期,在全党办报的方针下,邓拓认为,“通讯工作要实现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通讯就要有最真实生动的群众内容,采取群众形式,依靠群众写作,才能把党报办好”,<sup>[5]287</sup>因此,他倡导“建立更为广泛的通讯组织,吸收每一个爱护革命工作爱护报纸的人为通讯员”,<sup>[5]282</sup>广泛开展边区通讯写作运动,培养一批工、农、士兵通讯员,文化程度低不会写作的采取通讯小组口述,推人执笔记录的方式,文化程度高、组织能力强的则组织通讯网,并且积极调动妇女写

作热情,编辑、记者与通讯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群众的思维结构、群众的语言,而不是生硬地搬用它们,不是在洋化的结构中套进一些群众的思维片断,在洋化的句子中格格不入地装进几个老百姓的土语”,要用“自然的手法”,“在文风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使我们的通讯具有群众的气派”。<sup>[5]288</sup>《人民日报》时期,为进一步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邓拓认为,“编辑部工作的重点应在报社之外,不应在报社之内。我们要想出一切办法,把千万根线索伸展到群众中去!”<sup>[9]</sup>他主张选拔能力强、水平高的编辑记者赴各省担任首席记者,同时也请各省市政治条件好的干部任特约记者,加强第一线的采访力量,并且鼓励记者、编辑多交朋友,开展广泛的社会交往,多交朋友,增强与社会各方面、各行业的社会互动,广泛聆听群众呼声,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地反应到报纸上来。另外,邓拓说:“高高在上的‘新闻官’是写不出东西来的。”<sup>[10]124</sup>对新闻单位中存在的官气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要求记者、编辑不要当“新闻官”,要深入第一线,深入群众之中。

邓拓是群众路线的倡导者,更是群众路线的实践者。作为党报党刊的社长、总编辑,他事必躬亲,“亲自带头指挥记者深入采访;他亲自处理来稿来信来访,指挥编辑部开展通讯员工作和读者来信工作”<sup>[11]125</sup>,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写了几百篇社论,上百篇理论文章,两百多篇杂文,始终坚持求真、求实,力求做到真实和客观。这种求真、求实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在他后期作品《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两部作品中有很多杂文都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不合乎实际的盲目行为。在《燕山夜话》《围田的教训》中他讲到农业生产要以史为鉴,合乎实际,吸取教训,在《一个鸡蛋的家当》引用明代小故事,对“用空想代替假设”进行批评。在《伟大的空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好说空话的作风,在《有法与无法》中,他又倡导技法要回到客观实际中去,遵循事物发展规律。而在《两点说明》《卷前寄语》《作者的话》《编余题记》等多篇文章中,邓拓认为读者要求和意见是非常有帮助的,鼓励读者向编辑部提出要求和意见,为给他写作提供方向,对于文章中的内容和观点不正确,也欢迎读者来信批评。

### 四 “书卷气”要以党性为根本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邓拓在办报实践中一直把党性原则当成自己办报的第一原则和根本原则,这是其与普遍所指的“书生办报”的不同之处。党性原则最初由列宁提出,是我国党报报刊遵循的根本原则,党性原则主要表现党报要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宣传贯彻党政策。受到列宁主义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接受了列宁的党报党性原

则,毛泽东曾作《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一文,也曾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sup>[12]</sup>邓拓的新闻理论是在党报理论形成与完善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他也把“党性”作为其报刊活动的首要原则。

在主编《抗敌报》期间,邓拓认为,“《抗敌报》的产生是有它的任务的,它要成为边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它要代表广大群众的要求,反应和传达广大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形与经验,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教育群众自己。”<sup>[5]258</sup>在1940年《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中,邓拓提出,共产党人办的报纸应该是“集体的宣传组与集体的组织者”,“我们的报纸必须具有明确的党性,它和人民性、民族性是一致的”。在《关于报纸的社论》中,邓更拓明确指出,“对于我们党的机关报来说,社论的观点一般地必须代表整个党的观点……而还应该忠实地表达党的观点”。<sup>[5]358</sup>这些观点无不表现出他坚定的党性原则观念。

这种“以党性为根本”的办报原则贯穿了邓拓的报刊活动,即使在特殊时期也可看到他对这一原则的坚持。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临,邓拓在《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中写到,“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邓拓曾作《中国救荒史》,是荒灾领域的研究者,但文中依然可见其对主观能动性的夸大,对“大跃进”运动的肯定。另外,在《“电子音乐剧”原来如此》中,邓拓把西方艺术归为“反动资产阶级用以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对西方艺术问题表现出意识形态层面的偏见。这类文章虽有偏颇,但也能反映出邓拓对党的维护和对党性原则的坚持。

邓拓是支持党的政策和“百家争鸣”的,他说,“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绝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方法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sup>[5]275</sup>在“百家争鸣”时期,《文汇报》《光明日报》进行了“大鸣大放”,在当时气氛的感染下,人民日报社有些同志要求《人民日报》进行“鸣放”,事实上邓拓也作了一些报道计划上报,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所以就一直“按兵不动”。“毛泽东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报的报纸大讲特讲,毛泽东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不宣传做了严厉的批评。”<sup>[13]</sup>邓拓在受到批评后又组织了宣传材料,但内容都是依据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

“作为一个敏锐的思想者,他不可能不想到如果鸣放超出毛泽东设想的框框,双百受挫,有会出现何种后果”,<sup>[14]</sup>“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对形势的客观思考和种种顾虑,基于党报宣传性质的认识,邓拓担心发表一些未经中央确认的观点会引起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混乱,从而影响共产党的威信”。<sup>[15]</sup>按照这种说法,在复杂的局势中,邓拓始终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政策,乃是出于高度的纪律性和忠诚感。这也正是“书生”邓拓坚持党性原则的特殊方式——建立在独立精神基础上的忠诚。日后事实证明,《人民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在“鸣放”中并没有盲目跟风,避免了更大的政治错误。

邓拓办报的“书卷气”来自于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兼收并蓄,这两种文化的共同作用使得邓拓一方面具有求真、求实的独立思考精神,因此他才不能成为长袖善舞、毫无政治操守的政客,另一方面又始终坚守党报党性原则,积极配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正是他报刊活动“书卷气”的精髓所在。

## 参考文献:

- [1] 吴廷俊,阳海洪.“健笔终存天地间”:论邓拓与书生办报[J].新闻大学,2006(4):18-19.
- [2] 李玲.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J].炎黄春秋,2006(7):45.
- [3] 吴廷俊,阳海洪.“健笔终存天地间”:论邓拓与书生办报[J].新闻大学,2006(4):19.
- [4] 李辉.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0.
- [5] 邓拓.谁领导了五四运动[M]//邓拓全集:第五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 [6] 彭真.《晋察冀日报》改刊题词[N].晋察冀日报,1940-11-09(2).
- [7] 于继增.邓拓创造的杂文辉煌[J].书屋,2007(3):55.
- [8] 成美,顾行.从《燕山夜话》学习邓拓的办报思想[C]//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0.
- [9] 邓拓.邓拓散文[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190.
- [10] 顾行,成美.邓拓传[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 [11] 胡绩伟.平生赢得豪情在:纪念邓拓逝世十周年[C]//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3.
- [12]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M]//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87.
- [13] 胡乔木.胡乔木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3.
- [14] 苏双碧,王宏志.1957年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J].炎黄春秋,2008(8):15.
- [15] 李玲.书生邓拓[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194.

责任编辑:李珂